

第一輯 家世・足跡・貢獻

第四章

在台時期的文化成就





收藏在中央圖書館的明代《永樂大典》殘卷。



臺北市南海路的「中央圖書館館廈」。



故宮一景。



故宮全景圖。



蔣復璁安葬於新北市三峽區天主教三德公墓。



中山博物院（後改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於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臺北市郊雙溪開幕，由蔣中正剪綵並和主持典禮的院長蔣復璁合影。



外賓訪台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時，由蔣經國（右一）和蔣復璁（後左）陪同觀賞。



1967 年臺北祭孔大典彩排時，蔣復璁向蔣中正講解時合影。



日本自民黨總裁、前首相岸信介（中）率團訪問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時，由蔣復璁院長陪同於國父銅像前留影。



陳立夫資政參加蔣復璁喪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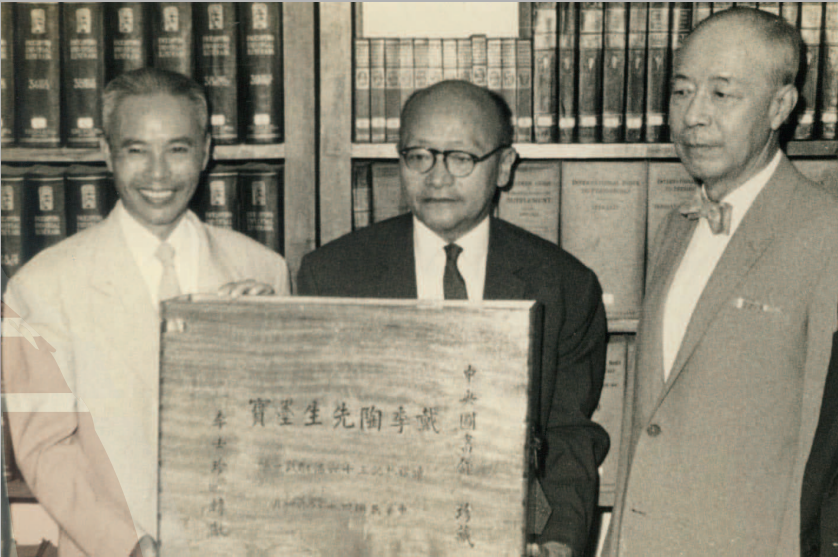
蔣復璁陪同外賓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名畫展覽。



蔣復璁陪同嚴家淦先生（左）參觀國寶文物字畫。



民國五十七年蔣中正先生巡視國立故宮博物院時與蔣復璁院長留影。



中央圖書館收藏戴季陶墨寶。朱家驊（右）、蔣復璁（中）、前中央圖書館特藏祖主任屈萬里（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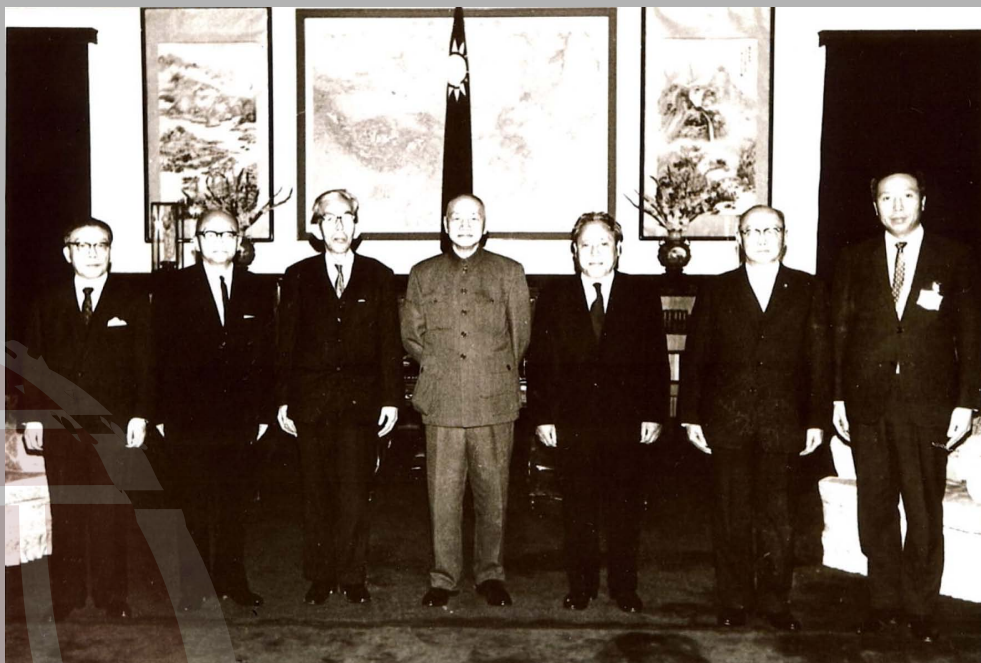
蔣復璁和北大校長蔣夢麟，參觀中央圖書館書庫。

恢復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民國四十三年八月，「中央圖書館」在臺灣恢復建制，父親赴任館長兼任省立臺北圖書館館長，後以本身業務繁重，未遑兼顧，推薦王省吾先生繼任，並自民國三十七年冬，將古籍文物運至臺灣，教育部則成立「國立中央博物院圖書館管理處」，以利接收聯管處中圖組保管之圖書文物。共計圖書四百六十六箱，內含運臺善本計有宋本二百〇一部，金本五部，元本二百三十部，明本六千二百一十九部，嘉興藏經一部，清代刊本三百四十部，稿本四百八十三部，批交本四百四十六部，鈔本二千五百八十六部，高麗本二百七十三部，日本刊本二百三十部，安南刊本二部，敦煌寫經一百五十三卷，共計十二萬冊。這些圖書文物來自於抗戰中期（約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間），經由教育部撥款、中英庚款補助，並派遣父親經渝秘密潛返淪陷區上海，收購自江南民間散出的古籍，外加抗戰勝利後也陸續接收許多散出的文物，皆列在其中。這些圖書文物不但是研究、瞭解中華文化的珍貴圖書資源，同時也是父親犧牲奉獻而獲得的寶貝。

中央圖書館在臺興建的計畫，是以臺北市南海路（原日治時代「靖國神社」）的房舍為基礎且進行改建。父親為了籌募款項絞盡腦汁且到處奔波，總算老天不負有心人，利用有限的修繕設備費及美援機構、國內外基金會的補助，逐年修葺添建，館舍始具規模。為此，父親曾於民國四十六年十月自撰楹聯懸掛於閱覽大廳，感慨中央圖書館之境遇，並藉以自勉。聯曰：

「百萬冊辛勤蒐集，多付秦灰。今屈指數來，珍存漢簡唐鈔宋刻明槧，皆瑯嬛秘笈。歷劫不滅，努力好古敏求，堪喜斯文猶在。十餘年慘澹經營，盡成陳跡。又從頭做起；粗備歐美典籍，東西輿圖，是知識寶藏。開卷有益，效法知難行易，必教失土重光。」



蔣中正接見日本客人時留影，蔣中正（中）、蔣復璁（左二）、何應欽（右二）。



國家圖書館全照。（國家圖書館提供）

接收流外之善本圖書

民國二十三年日軍侵華，華北局勢動盪，政府下令文物南遷，國立北平圖書館特選善本圖書六萬冊，連同敦煌寫經、明清輿圖、金石拓片及重要西籍裝箱運滬，寄存於公共租界處。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因發生珍珠港事變，上海租界岌岌可危，該館顧及存書之安全，經駐美大使胡適先生協助後，徵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同意，於年底將存滬精善本圖書一百〇二箱交商輪運美保管。美國國會圖書館並延聘北平圖書館前館長袁同禮先生為書目專家，就近照拂一切。民國五十四年二月袁先生病逝，父親感念該批圖書在美乏人照顧，慮其散失，而臺灣學術研究風氣日盛，需求善本古籍至殷，乃報請教育部核准，轉請外交部與美方商洽，由中央圖書館派父親的門生張東哲先生將該批圖書運台暫管，寄存於故宮書庫。關於此事，父親曾於民國五十五年三月，撰寫〈運歸國立北平圖書館存美善本概述〉一文（刊於《中美月刊》十一卷三期），詳述其經過。

創辦「宋史研究會」

中央圖書館在臺恢復後，除了負責接收許多珍貴的善本圖書外，也舉辦各樣書展和恢復出版品國際等交換業務，並廣泛開展國內外的學術交流，如創辦「宋史研究會」就是其中一例。

宋朝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文化學術思想發達，詩詞文章優美，但無論北宋、南宋均因不察周圍國情，而亡於外交。叔祖父蔣百里是研究文史哲的專家學者，其口述著作《宋之外交》，

有精闢見解。父親受其影響至深，同當時在臺大中文系任教的北大老同學姚從吾（註二），反覆討論、研究宋代的相關論著，進而在中央圖書館恢復後，創辦了「宋史研究會」。

「宋史研究會」由各方專家、學者每月聚會，並發表論文，展開學術研討。當時除父親之外，姚從吾院士、方豪、趙鐵寒先生及後來擔任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的宋晞教授皆是著名的治宋專家。（「宋史研究會」於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劉子健先生自美返臺後，推動改組為「宋史座談會」。）此後，父親出版的重要作品有《宋史新探》，收錄於書中的文章如〈宋代一個國策的檢討〉、〈宋遼澶淵之盟〉，皆是極有研究價值的文章；另外還撰有《宋代文集篇目索引：編纂計畫》、發表王安石評傳、岳飛傳記等介紹宋代歷史名人的相關文章。

在國內，父親除了創辦宋史研究會推展中華文化外，還提供豐富的館藏史料、圖片，讓文化大學編纂出版《中華五千年史》及《孔子聖蹟圖》；而對外的文化交流上，中央圖書館則贈予歐洲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兩千餘冊精裝圖書，協助該校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

新館落成，美夢成真

民國五十四年，父親應全館同仁的請求，擔任榮譽（名譽）館長終身職。民國七十五年秋，臺灣行政院撥款十億台幣給中央圖書館，由王世杰先生旅美建築家女公子設計，並在王振鵠館長領導下另覓新址臺北市中心（中山南路中正紀念堂對面）建造新館。新館落成時父親感到十分安慰，感

慨地說：「終於看到中央圖書館有了這樣美好的館舍，我多年夢寐以求的願望成真了！」開幕前父親親自撰寫一副對聯祝賀，高懸館內的中堂大廳：

學海無涯藏百國寶書；
名山永籌傳千秋偉業。

父親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的三十餘年間，圖書館建設的發展獲得不少領導人的關心支持。在大陸時期，關愛最多的是朱家驊、陳立夫、王世杰、胡適等；在臺灣時期則是受到當年教育部的前後任領導，如張其昀、梅貽琦、黃季陸、閻振興等大力支持；另外，曾在館內服務並共同為中華圖書館事業奮鬥的專業人士，如嚴文郁、徐鴻寶（森玉）、鄭振鐸（西諦）、尹石公、錢鍾書、屈萬里、顧廷龍、繆鎮藩、王省吾、查良鏞（金庸）、翟晉夫、昌彼得、蘇瑩輝、任簡、王振鵠等，都曾作出重要貢獻，加深了中央圖書館的文化內涵。

朱家驊先生、胡適先生均為父親於北大求學時的老師，為當時最年輕的教授。他們留學德、美返國後，受蔡元培校長邀請延聘至北京大學執教，將西方的思想、先進的科技帶入中國，並結合我國的國情，成為自「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的傳播者。基於對文化傳播的重視，朱家驊先生非常鼓勵父親創辦中央圖書館，同時因朱家驊擔任中英庚款會的董事長，故在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院的建成方面，提供了金錢上的支援，是重要的支柱。朱家驊先生於民國五十二年逝世，父親特致輓聯，對恩師為中國圖書館、博物館所做的貢獻，表以最高的敬意：「空留勳績三千牘，莫報深思四十年。」胡適先生則是於父親創辦圖書館時，提供許多建議和幫助，特別是中央圖書館在臺灣恢復籌

建時，不但得到他許多的指點，還由他所領導的「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進行資金補助。父親於民國四十九年胡適先生七十壽辰時，特撰詩慶賀：「墨家救國，儒家修身，碩德耆年仁者壽；漢學考經，宋學論道，金聲玉振聖之和。」表揚他一生的成就和對文化界的貢獻。

推行祭孔大典，傳揚儒家文化

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因時局尚未穩定，社會動盪不安，祭孔典禮往往無法如時在各地舉行，有些地方甚至沒舉辦，不若以往的朝代皆有著確切的時間和禮儀。一直到了民國五十七年，教育部奉命於先總統蔣公的指示，邀請相關學者、專家組成「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並由父親擔任主任委員，分別成立禮儀、服裝、樂舞、祭器四個研究組，進行祭孔典禮的研究和規畫。

經過兩年的檢討，於民國五十九年由內政部公布實施，規定臺灣各地區於每年秋季九月二十九日（教師節），舉行莊嚴隆重的祭孔大典，其中典禮實施的禮儀、服裝、祭器以至樂舞等各種儀式規格，延續至今。參加典禮的文武百官，無論中央或是各縣市地方，在祭孔典禮時都一律身穿中國傳統服飾，黑色長袍馬褂，對這位偉大的至聖先師，表示最高的崇敬。父親同時也為各地修復孔廟制定方案。規定在建築藝術上，統一採用傳統風格，並大力宣揚孔子、儒家對中華文化的深遠影響。

因著在台祭孔典禮的推廣，東亞各國如韓國、日本也都相繼效法舉辦祭孔活動；近年大陸在山東曲阜孔廟每年也舉行祭孔典禮，並在海外大規模地設立「孔子學院」，負責教授漢語、宣揚中華

文化。目前北京的中央電視臺為宣傳弘揚中華文化，結合了文藝表演的形式，以生動活潑的「中華情」，組織藝術家及文藝團體，在國內、國外舉辦無數場巡迴表演。這種文化創意效果甚佳，對深入海外僑界、促進各國的文化交流，發揮了深層的影響，也提升了中華文化的國際地位。

故宮的前世今生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滿清皇朝被革命派人士推翻。中華民國建立十餘年後，將清末退位皇帝溥儀逐出北京紫禁城，開始清點、整理自宋、元、明、清四朝承襲而來的宮中文物，並在民國十四年十月十日，於北京皇宮宮殿群之地正式成立故宮博物院，公开展覽皇室收藏和稀世珍品。

民國二十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並侵占東北，北京、天津局勢動盪；民國二十二年，日軍侵入山海關，情勢更加危急；民國二十三年二月，政府決定將故宮文物分批南遷至上海，以策安全。故宮運出的文物共計有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箱，其中包含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及國子監等三單位文物六千〇六十六箱。民國二十五年底，南京分院建成，故宮文物遂由上海移運南京朝天宮新建的庫房存放。民國二十六年發生七七事變，故宮博物院先是選擇部分文物精品八十箱，經武漢，轉長沙、貴陽、安順，最終運至四川巴縣；十月間淞滬戰起，繼而運出文物一萬六千箱，分由水陸兩路運至內地，最終分別藏於貴州省安順（後運往四川巴縣）、四川樂山及峨眉山三地。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及故宮博物院等機構疏運之文物相繼還京。民

國三十七年九月國共情勢逆轉，中央政府再次奉令挑選文物精品，包含故宮二千九百七十二箱、中央博物院八百五十二箱，由海軍司令桂永清將軍先後派軍艦「中鼎號」、「崑崙號」運臺。繼由招商局海輪續運，共分三批圖書文物，先是存貯於楊梅鐵路局倉庫，再遷至台中糖廠，而後又遷藏於台中霧峰北溝。關於兩院業務及文物，由教育部成立「國立中央博物院圖書院聯合管理處」管理。

民國四十五年，在蔣中正夫婦、臺灣省主席陳誠的關心下，臺灣獲得美國的亞洲基金會補助及行政院撥款，在台中霧峰北溝建造了一所一百八十餘坪（近六百平方米）四間平房展示廳；民國四十六年春，開張後擇精品展出，國內外民眾蜂擁前往觀賞中華文物國寶；民國五十年，故宮博物院攜帶國寶文物遠涉重洋，赴美國巡迴展覽廣獲好評；民國五十四年，籌建的中山博物院（後改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臺北市郊外雙溪建成，並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日剪綵開幕。經蔣中正先生謹慎評選，聘請父親蔣復璁從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調任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且另將國立故宮博物院改為隸屬於行政院管轄。

父親上任後，首先將儲存台中之文物箱件相繼北運，並存放於雙溪山洞庫中。圖書部分因一時無法容納，暫存於鄰近物資局倉庫，直至翌年二月續繼北運。至此，北溝文物全運至臺北，教育部所設立之聯管處業務遂告結束，原中央博物院文物則全部併入國立故宮博物院。而中央政府出於對中華文物國寶的重視，特地成立「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由常務委員及委員組成，並設立正、副主任委員，均由各部門之黨國要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出任。往後若有和國立故宮博物院相關的要事，皆由此專門機構負責領導和職掌。例如，每兩年選舉一屆院長，並上報行政院核准聘任；

討論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編制、院廈的擴建計畫；決定影印《四庫全書》等重大事項。自海峽兩岸開放探親、旅遊後，為了區別起見，將原在大陸的故宮稱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而在臺灣的故宮稱為「國立故宮博物院」。

目前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要收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宮廷瑰寶，分為十四大類，下設器物、書畫、圖書文獻三處及展覽、出版、登記三組，重新點查、整理、登錄文物並與其他機關學術展開文化交流。國立故宮博物院大約收藏七萬件器物，包括銅器、瓷器、陶器、玉器、漆器、琺瑯器等。尤以西周出土的青銅器毛公鼎、散氏盤為首，毛公鼎內腹銘文達四百九十七字，被譽為「抵達一片尚書」；漢至五代的陶器、玉器，以光緒皇帝愛妃陪嫁之精美絕品「翠玉白菜」最著名；瓷器則以宮窯精品為主，數量達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件。如宋代五大名窯「丁香紫尊」、明朝宮窯「釉里紅菊花」；清代康熙乾隆三朝則藏有琺瑯彩瓷器的絕大數精品；另保有存世數量稀少的宋汝窯等。除了瓷器、青銅器外，另一重點收藏是書畫部分。書法方面，有懷素的《自敘帖》；顏真卿的《劉仲使帖》及《祭侄稿》；馮承素的《蘭亭集序》摹本；經文方面，則有以藏文寫成的《大藏經》等；繪畫方面，有宋朝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李思訓的《江山樓閣圖》；宋朝畫家張擇瑞的《清明上河圖》摹本（原著在北京故宮）。另有書聖王羲之名品《三希堂法帖》中的《快雪時晴帖》（另有《中秋帖》、《伯遠帖》在北京故宮）；元朝名家黃公望所繪《富春山居圖》各半幅分藏於杭州浙江省博物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義大利人傳教士畫家郎世寧的西洋風景畫、畫人物、動物畫，其代表作為《鳥譜》、《八駿圖》等。

蔣中正晚年時常在其夫人宋美齡陪同下，親自前來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觀、視察，事無巨細，關懷備至，尤其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幾次擴建，所需的大筆經費均在蔣中正的批示下完成，後來經國先生繼之。而今國立故宮博物院能夠有如此規模的發展，完善先進的硬體及軟體設備都是開始於那個時期打下的基礎，說明蔣中正父子兩任總統的重視，以及故宮管委會、各級領導，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是分不開的，自然也離不開父親十八年辛勤努力的成果。他在許多管理上的精心規劃，開拓具遠見的創舉，使得國立故宮博物院成為聞名世界的五大博物院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典藏中華文物瑰寶精華之殿堂，在世界上聲譽卓著，來觀賞的人絡繹不絕，由父親接待的各國元首計有：美國副總統尼克森、阿格紐、日本首相岸信介、佐藤榮作、韓國總統朴正熙、新加坡內閣總理李光耀、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薩爾親王，菲律賓、南越（今越南）、馬拉威總統等，他們皆對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中華文物之精美絕倫，讚嘆不已。

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管理成就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遷至新院舍後，在首任院長蔣復璁的主持下，進行各項業務規劃及整理工作，其重要措施有以下幾項：

（一）院廈擴建與組織擴編

在父親任內，故宮館廈共擴建三次：第一次為民國五十五年底建圖書館一座；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就前次擴建之兩翼，向外延伸作為閱覽場所；第三次則在正館右側行政大樓增建，為故宮發展史

之里程碑。父親另外還在山腳進出口處，規劃設計兩座仿宋花園「至善園」和「至德園」，繼由後任院長秦孝儀先生領導完成；又在行政大樓旁，新建「圖書文獻館」。公元二〇〇〇年後再次進行大規模的展覽場地及露天廣場擴建工程。自此，始成現在之規模，外型更顯得莊嚴宏偉。

伴隨故宮第一次擴建，組織新編制之修訂問題提上日程。故宮業務單位原僅設有古物、書畫、出版三組室，蔣復璁有鑑於圖書文獻展覽及登記等業務之重要，呈准修訂組織規程，增設圖書文獻、展覽及登記三單位。民國五十九年再增設科學保管技術室，負責文物之保存、維護與鑑定研究工作，至此，組織始臻完善。

（一）文物整理與登錄

父親是圖書館學專家，運用其所長將國家的文物以目錄學進行分類且精心歸納，使故宮文物得以有系統地管理。如在文物南遷時，雖大都分類裝箱，但並未區分細目，遷運臺北後，始規劃分類裝箱儲存。每一器物編製卡片，並附照片，詳細登入其字號、品名、形制、紋飾、銘文、尺寸、重量等，以供查檢，建立起嚴密、安全的管理制度。

父親到任後，特別重視登記組之設置，以掌管所藏文物之登記與分類事項。民國六十年起，故宮開始建立各類文物統一編號系統，訂定文物檢索制度，於民國六十一年進行藏品之點檢工作。歷時三年之努力，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兩院運台文物三千八百二十四箱，全部點查編號完竣，故宮藏品由原粗略統計之二十四萬件，劇增至六十萬八千餘件，再經反覆核查，藏品總量達六十四點五萬件。六十多年來，故宮獲海內外捐贈、收購、寄存文物亦達數萬件之多。

（三）文物展覽與推廣出版

當故宮文物於臺北整理編目時，同時也開展編輯出版與研究工作。如故宮收藏宋金元圖書逾兩百部，其中不少孤本秘笈。民國五十九年起，為響應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特選孤本論語、孟子等書依原式影印出版，深受社會人士珍視；民國七十一年初更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就故宮所藏之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普遍發行。此書卷帙巨大，全部精裝一千五百冊，成為出版界一大盛事。另外，在檔案出版方面，印有舊滿洲檔及康熙、雍正、乾隆、光緒四朝宮中檔，每套達一百五十巨冊，為研究滿清之重要史料。

此外，故宮為推廣中華文化，曾與國外著名印刷機構合作精印院藏書畫珍品。如民國五十九年與日本東京學習研究社合作，選印「故宮文物選萃」，共出版五輯二十五冊。內容包括故宮收藏之各類文物，迄今發行已在百萬冊以上；又與二玄社合作，選印製名家書畫一百件，影印得相當精緻，成品不遜真跡。故宮還特設文物書畫的複製品販賣部，提供民眾進行選購，不論是作為自己的收藏或用於饋贈親友，皆是最佳的紀念禮物了。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父親自民國七十二年從故宮院長退休後，以中央研究院院士身分，受邀參加甚多國內外學術會議，發表專題演講論文。如中研院召開的「國際漢學會議」，行政院文建會主持召開的「國際孔學會議」，中央圖書館主持召開的「紀念王國維先生逝世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而在晚年時，父親

最常去的地方仍是由其一生心血所創立的中央圖書館，除了關心它各方面的發展之外，特別對培育人才尤為重視。民國七十八年春，他以九十一高齡還在館中開設「善本目錄」講座，每週一講，長達三月餘。圖書館界高層學員對父親敬業精神極為感動，尤其是他思路仍然清晰，就館編善本擇要講述各書源流及版本特色，娓娓道來，如數家珍。

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突然吐血過世，震驚兩岸乃至世界，臺灣人民沉痛哀悼他的逝世，張學良也趕到臺北榮民總醫院靈堂鞠躬致哀。父親曾做一副輓聯，深深的哀悼這位朋友兼領袖：「萬方多難痛愛動，嘔心瀝血蒼生計；一物不遺感知遇，淪肌浹髓國士恩。」

民國七十九年夏，國立故宮博物院在秦孝儀院長主持下，開始進行典藏文物國寶大清点。父親亦受聘出任清点委員，兩人一組進行核實驗收，簽字方成。不料清点尚未結束，即發病而止，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因白血病症在臺北榮總醫院過世。他一生可以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同年十月十三日上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天主教臺北教區、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大學等聯合成立一百二十七人的治喪委員會，在臺北市新生南路天主教堂舉行隆重的公祭，天主教大彌撒追思禮。宋美齡女士也派人送來一個用白菊花組成的十字架圈致哀。臺灣的文化、藝術、教育界隔天還另外舉行了專場追悼會。父親的靈柩上覆蓋中國國民黨旗、中華民國國旗，標示他對中華民族的忠貞。之後遺體安葬於當時的臺北縣山峽鎮的天主教三德公墓，此墓園為父親生前親自選定。父親亦在半山上的墓園設計築造幾個石凳子，以便讓爬山上來的掃墓者可以歇息，並在四周石欄杆上雕刻中國傳統石獅子頭像，象徵吉祥如意、

避邪納福、子孫昌盛發達之意，可謂設想十分周到。父親遺願是返鄉移葬杭州，墓碑要求刻上「六十年圖書館員 蔣復璁」。我與祖康堂兄又在故鄉海寧硤石老宅，為父親舉行祭奠儀式，族中鄉親紛紛前來行禮，願他早升天堂、光照故里。遺像兩旁懸掛一副輓聯為：「忠孝仁愛堪垂青史，禮義廉恥足勵後人。」生前則留有一副自輓聯明志：「碌碌無能一生只做一樁事，嘗盡甜酸苦辣。勞勞不息終歲難偷半日間，渾忘喜怒哀愁。」民國八十年春，最高當局發布「總統褒揚令」，追認他一生為國家和弘揚中華文化做出的偉大貢獻。

父親早年在北大求學，又在北京工作十四年，使他結識了很多有學識、有地位的名人，豐富了人脈的關係。當時的北京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的策源地，各方人士包括文化界、教育界、軍政界的頭面人物，皆聚集在此。他一生的事業、生活受叔父蔣百里所影響。百里公引領他朝圖書事業道路發展，也帶他出國訪問，並教導他儀表服飾、西餐禮節，身教勝於言傳；百里公對佛經、天主教義都多有研究，這對父親以後信仰天主教，也有一定助益；另外，因百里公一生到處奔波，故平時由男僕侍候生活，而父親在重慶、後至臺灣，也皆是如此。

叔祖父蔣百里青少年時代正是國難深重時期，他憤於甲午戰爭中國失敗之恥辱而習軍事，留學日、德名校，榮獲日皇賜刀，受到德國興登堡元帥的賞識，返國以圖報效國家。返國後出任保定軍軍官學校校長，大力整頓改革，備受軍閥掣肘後，參與護國反袁，擁護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吞我國東北，中國進入抗日戰爭階段，他受聘為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巡視遍訪各地防務，以軍事家卓越的膽識和判斷，高瞻遠矚地向中央建議應

加速發展空軍，並提出我國抗戰應遵守三條指導原則：一為發動全民抗日進行持久戰，其名言「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和日本講和」。二為有意在上海開闢新戰場，爆發八一三淞滬戰役，截斷日本侵華從北至南的軸線，以防其機械化部隊利用鐵路快速南下，並引導其戰線由東向西，以延緩腹地武漢過早陷落。最終爭取到一年多的寶貴時間，讓我國中央緊急部署大規模的撤退工作，化被動為主動；三為制定國軍堅守湖南衡陽、湖北襄陽、貴州貴陽，作為退無可退的底線，以確保西南的抗戰中心陪都重慶，即著名的「三陽戰略」，同時也預見日本將失敗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終於徹底潰敗，無條件投降，中國的抗戰隨著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面勝利，而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百里公雖未見到抗戰勝利，過早地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病逝於廣西宜山，但由他協助蔣委員長提出制定此抗戰戰略是十分英明的，同時也是他生前最後為國家、中華民族存亡作出的最大貢獻。他生前曾引領了最親近的兩位小輩走上了正確的事業道路，一為侄子父親蔣復璁，二為早年杭州求是書院、爾後又同為留學日本學教育的老同學錢均夫獨子，後來成為他女婿的錢學森。此兩位小輩均不負期望，終分別成為了我國近代圖書、博物館學，及航太物理學之開拓者、奠基人。父親蔣復璁被人們譽為中華文物瑰寶的守護神，而錢學森則被譽為中國的航天導彈之父，一文一武，成就斐然，不能不歸功於百里公的栽培和提攜。父親曾和薛光前先生合作主編出版《蔣百里先生全集》，錢學森則在臨終前囑咐，將百里公由杭州遷葬至故鄉浙江海寧的「百里梅園」。

父親一生的機遇、榮譽和國家的命運是相通的，但主要還是因為有幸追隨叔叔蔣百里、恩師朱家驊、領袖蔣中正。三位貴人提攜和知遇之恩，是國家發展的需要，也是時代發展的機遇創造了條件，外加父親一生酷愛圖書專業，並有著堅忍不拔的意志、一生奉公的崇高品格，是造就他為文化

界帶來許多貢獻的原因。

總結父親一生的事業為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故宮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圖書館長、終生榮譽館長、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研院評議會評議員、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顧問、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動委員會（現改稱中華文化總會）常務委員、中華民國孔孟學會常務理事、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德文經協會常務理事、中阿友好學會監事、中韓友好協會理事，天主教「光啟社」董事、天主教宜蘭「弘光仁愛之家」養老院董事長、天主教臺北教區爵士會會長、臺北浙江海寧同鄉會名譽理事長，臺灣大學、臺灣師大、輔仁大學、文化大學教授、研究所博士生導師，且於一九六一年獲韓國成均館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一九七四年獲美國聖諾望大學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還先後榮獲德國慕尼黑大學、威茲堡大學、美國天主教聖諾望大學頒授獎狀；另外尚有海內外著名學術機構、文化藝術團體的眾多獎章、獎狀；國民政府也曾在一九七四年頒發勝利勳章，一九八三年春頒發景星二等勳章、頒發教育部金質獎章，一九八五年獲行政院文化獎章獎金等；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七年則分別榮獲天主教羅馬教廷頒授聖額吾略爵士、高級爵士聖銜，並獲教皇保祿二世頒授聖喬治勳章和梵諦岡伯多祿大教堂聖殿鑰匙。其親筆手稿則收藏於國史館。

註一 北大畢業後留學德國，是研究滿、蒙史的專家。抗戰勝利後出任開封河南大學校長，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抵台後在臺灣大學中文系擔任教授。